

全球智库半月谈

全球化的“受害者”应得到补偿

IMF:布雷登森林体系与固定汇率

达沃斯，中国角色的转变

央行会有更多的独立性吗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内涵及其重要性

菲律宾政治变得更加危险

本期编译

安婧宜

郭子睿

侯书漪

黄杨荔

司丹

谢晨月

许平祥

杨茜

伊林甸甸

张舜栋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常殊昱	国际金融	侯书漪	科研助理
	安婧宜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 洋	科研助理	刘 畅	科研助理
周 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侯书漪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将死的 TPP 协议 7

导读: TPP 协定正式生效要求美国必须批准。如果美国确定退出 TPP, 其他签署国应改变 TPP 的规则以使协定继续推行。同时, TPP 可以拉拢其他大型经济体的加入。退出 TPP 使得美国放弃其主要利益, 逐渐被边缘化。

特朗普不会发动全面贸易战 9

导读: 众所周知, 特朗普对全球化充满敌意, 在大选期间发表了许多废除自由贸易协定的言论。那么, 当选后, 特朗普是否会发动全面的贸易战? 作者认为, 尽管特朗普有能力大打贸易战, 但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 特朗普在国际贸易问题上只会采取有限的收缩措施, 而不太可能发动全面贸易战。

全球化的“受害者”应得到补偿 11

导读: 全球化使得各参与方都受益良多, 但客观而言, 全球化也损害了一些工人的利益。这些全球化的“受害者”对全球化的失望和怨气, 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认为, 推动全球化更要关注推进全球化的普惠性, 各国政府都应该注意补偿全球化的“受害者”, 让全球化进程与各国国内的收入公平同步发展。

全球治理

给予亚洲在全球金融监管中的职责 13

导读: 过去十年中, 全球金融监管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 但并不十分有效。随着美国政策转向国内, 中国应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担任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IMF: 布雷登森林体系与固定汇率 15

导读: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金本位制的衰落引发了关于固定和浮动汇率制度的争论。本文主要探讨经济学家们关于布雷登森林会议上汇率制度提议的一些主要观点和为什么浮动汇率制度的争论能如此快的消失。

经济政策

美国制造业: 特朗普会遣回高收入工作吗? 18

导读: 特朗普计划为美国遣回高收入的制造业工作, 但制造业收入真的会比服务业高吗? 而且, 劳动力在不同的部门之间很难转移。激进的贸易政策也许会为制造业创造工作, 但不一定有利于所有的普通市民。

央行会有更多的独立性吗？ 20

导读：过去的30年，发达经济体大多数的央行被赋予独立实施货币政策的权利，不受财政和政治当局的干预。最近一项关于欧洲央行未来会有更多独立性的调查显示：第一，70个受访人员中只有31个不同意在可预见的未来，英国和欧元区央行的独立性会有重大变化；第二，央行独立性的下降可能会带来更高的通胀。

聚焦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下一战场——“一带一路”倡议与伦敦市场** ... 22

导读：本文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和中国社科院合作研究的成果。文章研究了利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来扩大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伦敦离岸金融市场使用的可行性。

达沃斯，中国角色的转变 25

导读：曾几何时，中国还因被认不負責任而饱受争议，如今它已肩负世界稳定的重担。在达沃斯论坛上，中国主席习近平的演讲指出，中国将继续促进全球合作和绿色创新，以此来保障全球经济增长。反观美国，特朗普的表现则不尽如人意。本文认为，未来中国将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世界格局也将经历沧桑巨变。

战略观察**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内涵及其重要性** 27

导读：被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名为国务卿的雷克斯·蒂尔纳森重申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引发舆论对该政策的关注。本文简要介绍该政策的内涵及其重要性。

菲律宾政治变得更加危险 31

导读：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执政以来，其对内、对外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内外相关国际问题专家对菲律宾的国内政策、外交政策以及总统杜特尔特进行了积极的关注和研究。2016年12月7日，对外关系委员会（CFR）网站发表文章《菲律宾政治变得更加危险》。作者主要介绍了现菲律宾政府执政的两个方面来体现杜特尔特的独裁统治和菲律宾的新政治危机，一是杜特尔特政府坚持将前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的尸体埋在英雄墓地，并引起了大规模的街头示威游行活动；二是提出菲律宾总统与副总统的矛盾冲突，以及菲律宾领导人容易受到黑暗势力和法外方式的强迫，最终导致总统离职的危险。

特朗普真的可以与普金打好交道吗 34

导读：作者认为，近来俄美关系的冷淡是因为俄罗斯的外交表现十分不切实际。作者回顾了近来俄美两国的矛盾焦点，并对特朗普上台后将面对的俄罗斯做了基本的定位，最后指出，未来的俄美关系，机遇与挑战并存。

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将危及台湾	36
-----------------------	----

导读：被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名为国务卿的雷克斯·蒂尔纳森重申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引发舆论对该政策的关注。本文简要介绍该政策的内涵及其重要性。

本期智库介绍	38
--------------	----

将死的 TPP 协议

Patrick O'Conno /文 杨茜/编译

导读：TPP 协定正式生效要求美国必须批准。如果美国确定退出 TPP，其他签署国应改变 TPP 的规则以使协定继续推行。同时，TPP 可以拉拢其他大型经济体的加入。退出 TPP 使得美国放弃其主要利益，逐渐被边缘化。编译如下：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议（TPP）几乎已经死亡。通过远离艰难的交易，美国失去了继续在全球贸易规则和市场自由化中的领导地位。这也向贸易伙伴发出强烈的信号：美国对亚洲的态度不那么强硬，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双方可能会进行更多的交易。更重要的是，如果美国确定退出 TPP，除了失去该协议的潜在好处之外，它会发现自己越来越被边缘化。

其他国家不应该受制于美国的民粹主义者与国内政治；市场自由化利益的虚假前提；以及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缺乏领导力的表现。相反，它应该继续推动 TPP 的实现（目前唯一的替代方案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尽管美国已经释放出不会批准的信号，但许多 TPP 国家也已经完成国内批准手续。

TPP 协定原则上将会在所有成员国完成国内批准法律手续后正式生效。如果 TPP 成员国无法全部通过 TPP 协定，那么在 TPP 签署之日（2016 年 2 月 4 日）起 2 年内一旦有 6 个国家以上完成法律手续并占到所有成员国 GDP 的 85%，TPP 将会在 60 天内生效。这一 GDP 的要求意味着如果美国不能批准 TPP，TPP 协定将不会生效，这看起来是不大可能的。

鉴于协定可能无法生效，TPP 的其他签署国应该忘记他们对美国贸易紧缩的任何担忧。相反，他们应该更加努力以实现具有广泛会员的高质量、区域性贸易协定的雄心，这需要对上面列出的规则进行修补。

规则的“修补”可以使其他国家签署新的处理办法以激活协议。这是让 TPP 继续存在的最简单方法，并且可以避免再一次的艰苦谈判。当然，这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现有的签署国关于协议的好处（在美国的参与下）可能是无效的，而且更难以说服利益群体。该协议失去美国的参与将会导致许多国家考虑是否需要重新谈判。这也为其他 TPP 成员国提供了一个改善贸易的机会。TPP 的生效要求使得美国和日本至关重要。即使美国仍有可能同意 TPP，那也是基于 TPP 应该重新开放以谈判美国没有得到它想要的其他要素。

鉴于美国在 TPP 协议上强硬的谈判立场，可能存在许多其他国家难以采纳的要素。如果这项交易没有美国参与，这些以美国为中心的要素可能会消失，对其余成员更加有利。

此外，为了增加 TPP 各方的利益，目前的成员可以考虑拉拢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大型经济体参与。TPP 明确允许其他人参与，特别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合作伙伴，如台湾，韩国和泰国。他们的参与可以构造一个更强有力的协议。这当然会使谈判更加复杂，但也会扩大所获的利益。

远离 TPP 对美国意味着什么？至少有三个显而易见的前景。首先，它将破坏其作为下一个世纪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秩序缔造者的地位。第二，它将被排除在一个雄心勃勃的贸易协定之外，因此在评估贸易利益后应试图重新加入。第三，它可以为像中国这样领导区域架构改革的国家创造空间。这将削弱美国的软实力，破坏支持者对美国的信心。

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成立。由于美国抵制对包括布林顿森林协定在内的国际机构进行改革，中国作为当前秩序的崛起力量和挑战者，试图创造自己的竞争秩序。许多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支持者，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都承认亚投行，不论美国是否抵制。他们选择加入亚投行，希望在潜在的未来国际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如果其他国家继续推行 TPP 而美国袖手旁观，美国将把自己逐渐边缘化。它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是否保持孤立，而不是打破新政府建立的隔离墙。这并不是说 TPP 的国际合作伙伴应该不再过问美国退出 TPP 的行为。相反，他们应该让美国考虑其作为当前全球秩序先锋的作用，看到它自己在 TPP 的利益。

本文原题为“TPP is dead - long live TPP!”。本文作者为非美国外交官，Patrick O'Connor 是其笔名。本文于 2017 年 1 月刊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特朗普不会发动全面贸易战

Gary Clyde Hufbauer / 文 张舜栋 / 编译

导读：众所周知，特朗普对全球化充满敌意，在大选期间发表了许多废除自由贸易协定的言论。那么，当选后，特朗普是否会发动全面的贸易战？作者认为，尽管特朗普有能力大打贸易战，但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特朗普在国际贸易问题上只会采取有限的收缩措施，而不太可能发动全面贸易战。编译如下：

美国《宪法》第八章第一条规定：“国会有权监管美国与外国、与印第安部落以及美国国内一些州之间的贸易。”因此不少参议员和众议员都认为，国会对美国签署的一切国际贸易协定具有提案权和最终决定权。然而纵观历史我们发现，几百年来国会一直赋予了总统充分的权限，以限制美国与他国的贸易。事实上，在自由贸易的问题上，国会一直显得十分“小气”。

要达成一项新的自由贸易协定，总统通常必须在相当有限的时间内领导团队完成谈判工作，并且得到国会的立法支持。然而，当总统希望限制国际贸易时，事情就显得简单的多。在特朗普之前，唯一采取措施限制国际贸易的总统是 80 多年前的胡佛总统。而胡佛甚至根本没有亲自动手，国会帮他完成了这项不光彩的任务，在 1930 年通过了臭名昭著的 Smoot-Hawley 法案。如今，如果特朗普希望再次促使国会通过类似的法案，他会发现这件事的难度与 80 年前相比甚至更低了！

在大选期间，特朗普反复宣称自己将“手撕”一切现存的贸易条约：重新进行 NAFTA 谈判、对墨西哥和中国商品分别征收 35% 和 45% 的关税、对在海外设厂的美商公司施加惩罚性关税等。特朗普还宣称，如果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任何异议，他要么逼迫 WTO 让步，要么干脆退出 WTO，因为 WTO “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当然了，虽然特朗普有能力发动可怕的贸易战，但这并不意味着贸易战即将爆发。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特朗普的态度已经有所软化，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他用甜言蜜语劝说 Carrier 集团放弃海外设厂，以保住其在印第安纳的工作岗位。这个案例代表了特朗普对美国大公司的谈判策略：刚柔并济，用威胁加补贴的方式逼迫其保住美国国内的工厂和岗位。这或许听上去有点像裙带资本主义，但起码比撕破脸的贸易战要好得多。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两位贸易问题高官，Wilbur Ross (商务部) 和 Peter Navarro (白宫贸易委员会) 都已经表示，总统的竞选言论只不过是谈判的策略而已。

当然，国会的立法工作也是很重要的。目前来看，特朗普政府在立法问题上的优先度从高到低是：废除奥巴马医保法案、进行税率改革、以及立法投资大规

模基建项目。这些雄心勃勃的法案起码要到 2018 财年才有可能全部进入投票程序，而且在参议院需要至少 51 票才能通过。既然如此，特朗普有什么理由要在这个关头冒着得罪传统共和党参议员的危险，搅这滩全面贸易战的浑水呢？

即便是有限的贸易战，特朗普政府所通过的任何法令也必将面对利益受损的美国公司所发起的持续不断的诉讼。当然，特朗普作为总统有权强行推动这些法令，但 WTO 组织内的其他国家可不会耐心地等待这些法律程序。也就是说，哪怕是有限的贸易战也一样会引起贸易衰退，这当然将损害包括特朗普支持者在内的所有美国人的利益。更糟糕的是，这还会将美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领袖地位拱手让给中国，这也是白宫里外交和战略顾问们所将极力避免的。

总的来说，特朗普政府几乎必然会在 NAFTA 问题上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展开激烈的进攻、对中国提出更多要求、废除 TPP 协定，并且搁置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的进程。这对于自由贸易者，包括我在内，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不过，如果特朗普仅仅止步于此，那么我们也大可放心，因为美国一定不会发动全面而惨烈的贸易大战。

本文原题为“*As President, Trump Can Shackle Trade. But Will He?*”。本文作者 Gary Clyde Hufbauer 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资深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1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全球化的“受害者” 应得到补偿

SILVIA MERLER / 文 伊林甸甸 / 编译

导读:全球化使得各参与方都受益良多,但客观而言,全球化也损害了一些工人的利益。这些全球化的“受害者”对全球化的失望和怨气,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认为,推动全球化更要关注推进全球化的普惠性,各国政府都应该注意补偿全球化的“受害者”,让全球化进程与各国国内的收入公平同步发展。编译如下:

在本周的辩论中, Maurice Obstfeld 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想法。他表示,各国必须在从全球化中获益的同时,注意推行更加公平的分配政策。诚然,所有人都有可能受益于全球化。但除非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更加关注分配的公平性,否则全球化的普惠性都仅仅是一种字面上的“可能”。

事实上,如果各国政府继续忽视这一点,那战后主导世界贸易格局的自由开放的趋势很可能走向凋敝。各国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必须确保国内的有效充分就业、确保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并关注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毕竟,在二十一世纪,各国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与其不切实际地幻想逆转全球化趋势,不如寻求解决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补偿那些在全球化中没有充分受益的,甚至利益受损的群体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恐怕不能过于乐观。正如 Gavyn Davies 所言,在经济和政治意义上都相对可行的补偿方案,如今还尚未具有雏形。

Antràs et al. (2016)研究了开放贸易的福利意义。他们发现,开放贸易提高了国内总收入,但也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平。他们提出,应该用税收转移体系来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发现,贸易引起的收入不平等抵消了贸易带来的 20%的福利效应,而引入税收转移体系后,贸易的福利效应将增加 15%。

有些人提出,我们可以采取普适最低工资(UBI)的方法来补偿受损的工人利益。Robert Skidelski 提出,随着工业机器人和自动化生产技术的爆炸式应用,推广普适最低工资(UBI)愈发显得紧迫。有反对者提出这将对国家财政造成过于沉重的负担,而 Robert Skidelski 则表示实情并非如此。过于的几十年里,生产力进步所带来的收益大部分流入了富人的腰包,只要我们改革收入分配体系,基于这部分收益进行再分配,普适最低工资(UBI)就是完全可行的。这将确保技术进步带来的财富增长不仅仅使少数人受益,而是也能够惠及大多数工人。

Danny Leipziger 则提出,普适最低工资(UBI)的前提是国家能够确保征税和再分配体系高效运转,而许多国家都做不到这一点。在全球化大潮中,许多跨国企业都有完善的避税技巧和丰富的经验。他提出,与再分配相比,政府更应该

促进就业，创造更多工作岗位。他认为，劳动力市场必须跟上技术进步带来的全球生产转移的趋势，这也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部分。

Harold James 在他的文章中写道，补偿方案存在有诸多风险。被政府资助去从事无意义劳动的工人，或许会变的更加游离于社会主流。当那些被全球化抛弃的地区的人们发现自己空吃救济而情况毫无改观时，他们会变得更加充满怨气。因此，单纯的补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想办法为他们创造更多就业的流动性。

历史上曾有许多人因为就业形势低迷而选择移民，今天，南欧和东欧的许多人依然选择这么做。即使在国内，从就业情况差的乡村移民至机会更多的城市也是十分可行的。当然，这要求工人具备更好的技术、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在全球化中失落的工人们必须明白，他们早晚要拥抱这一现实，用不断学习的精神和更适应时代潮流的技巧武装自己，而不是屈服于怨恨和抱怨。令人惋惜的是，美国和其他大多数发达工业国僵化的教育体系，使得许多人并没有具备良好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这也阻碍了他们实现自身工作技能的升级。

Asatryan et al. (2014)研究了欧洲的案例，并且提出补偿方案应该更倾向于受进口冲击的产业工人。与其单纯发放失业补贴，补偿方案应该更重视培养工人的工作技能，以帮助其适应新的时代潮流。长远来看，健全的技能培训和教育体系对于推进全球化的普惠性而言至关重要。具体而言，加强低收入群体子女的早期教育，是减轻教育不平等以及收入不平等的有力手段。

本文原题为“Compensating the “losers” of globalization”。本文作者 SILVIA MERLER 为 Bruegel 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1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给予亚洲在全球金融监管中的职责

NICOLAS VÉRON/文 侯书漪/编译

导读：过去十年中，全球金融监管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并不十分有效。随着美国政策转向国内，中国应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担任一个更重要的角色。编译如下：

过去十年中，全球金融监管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并不十分有效。去年十一月的美国总统大选过后，亚洲特别是中国应承担起更重要的角色，以确保全球金融体系运行良好。

与其他国际经济合作方式相比，全球金融监管体系仍处于发展初期。这是一个由不同组织组成的网络，其中许多组织不具有法律效力，金融稳定委员会则作为协调枢纽。

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其积极影响日益凸显。例如，得益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因审慎规则自相矛盾导致的跨境竞争扭曲有所缓和，在监督各国遵守其商定的标准方面也越来越有力；尽管一个共同的基准暂时缺位，然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会计准则的广泛采用大大提高了上市公司利润表的国际可比性；全球法人实体识别基金会向某些交易参与者发行代码，由此开启了互操作金融数据格式通用的道路。由于全球金融体系愈发多元化且关联度提升，在普遍认同的基础上通过公共金融部门开展联合工作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因此，全球金融监管体系更加可贵。

除了上述机构，监管体系的主要参与者也包括以条约为基础的组织，如主导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及其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这些参与者由独立的团体进一步补充，如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国际保险监管协会和国际独立审计监管机构论坛等。虽然以条约为基础的机构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但是，这个全球网络中的其他实体都未超过 45 岁。

全球金融监管体系一直不平衡，也需要改变——新的金融中心不断冒出头角，尤其是其在亚洲地区的出现挑战了北美和欧洲国家的主导地位。自 2008 年解决全球金融和经济问题从 7 国集团会议转移到 20 国集团首脑会议之后，这个体系有了显著改善。例如，巴塞尔委员会和金融稳定委员会的成员队伍已扩展到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和金融中心。然而，失衡依然存在。最近一项统计显示，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 27 个最高级领导职位中，只有一个由北大西洋国家以外的国民担任。几乎所有该网络的实体都把总部设于北大西洋地区，唯一的例外是独立审计监管国际论坛的常设秘书处，即将在东京设立。

未来的挑战

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制度上的脆弱性即将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的考验。他的“美国第一”立场必将给所有国际合作框架带来多重挑战，金融监管也不例外。

对于这一考验的应对措施应包括加快全球监管体系的加速再平衡和改革，以确保其在新环境中的活力。亚洲，特别是中国，应该在整个体系中扮演一个更为中心的角色，其他国家应一起促成这一演变。具体来说，中国应该推荐高素质的官员从事全球金融监管机构的领导职务，并在他们的工作小组中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随着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展开，加上目前欧洲内部的困难，中国正快速成为全球共同努力中不可缺少的根基，中国也应在全球讨论中有相应的表现。

在此情况下，欧洲应减弱其在系统中的影响，为亚洲和中国的领导留下更多余地。具体来说，欧洲的银行业联盟意味着各个欧元区国家独立负责金融稳定的想法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其权力应由欧元区和欧盟取代，巴塞尔委员会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既然银行监管政策已在欧元区广泛推行，那么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和西班牙的独立会员制度就应逐步退出。

即使新一届美国政府最初并未采取举措，有关机构也应进一步提高系统的有效性，以证明其持续的相关性。例如，国际结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银行应进一步协调金融统计和数据收集的格式；全球监管标准应在需求明显的新领域大力发展，如衍生金融商品领域；此外，还应考虑如何对金融系统中有限但关键的环节逐步建立起全球层面的监管，可以从那些在危机中不会产生财政方面影响的机构，如信用评级机构或审计公司开始。

过去十年的事件充分表明，我们需要强大的全球监管组织来控制跨境金融一体化的内在风险。在美国单边主义存在发展趋势的前景下，应促使中国、其他亚洲国家和欧洲迅速调整力量，以防止现行有益的金融监管体系瓦解。

本文原题为“Giving Asia its due in global financial regulation”。本文作者是 NICOLAS VÉRON，Bruegel 高级研究员、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1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IMF:布雷登森林体系与固定汇率

Douglas A. Irwin/文 许平祥/编译

导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金本位制的衰落引发了关于固定和浮动汇率制度的争论。本文主要探讨经济学家们关于布雷登森林会议上汇率制度提议的一些主要观点和为什么浮动汇率制度的争论能如此快的消失。编译如下：

引言

金本位制衰落十年后，在 1944(数字改为宋体)年布雷登森林会议上关于国际汇率制度的争论达到了高潮。大部分经济学家和布雷登会议的参与者支持固定但是可调整的汇率制度。在目睹了金本位衰落后关于汇率制度的争论后，我们转向经济学家们对凯恩斯和怀特计划的态度，由此形成了布雷登森林协议的基础。最后，我们看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和布雷登森林体系实行后关于浮动汇率的争论。

1、金本位衰落的教训

Keynes (1923) 认为一个国家尤其是中央银行面临着国内目标（稳定物价）和国际目标(稳定汇率)的选择困境。当国内物价稳定和国际汇率稳定不一致时，前者通常是更重要的。在这条逻辑的指引下，凯恩斯反对返回到一战后实行的金本位制，同时凯恩斯反对只关注国内物价稳定，怀疑一个如此消极和干枯的体系的判断力和实践力，像欧文费雪的美元补偿方案。

Keynes (1923 , 186) 建议建立 一个混合体系：“我的方案需要英格兰银行采取高标准的价格稳定作为他们的基本目标--这不会阻止他们致力于实现汇率稳定。”当 1929 年前后金本位开始失灵，国家开始经历萧条，他们开始放弃金本位制，采取稳定价格而不是稳定汇率，像 Keynes 所建议的。众所周知，离开金本位的国家能够追求更加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帮助刺激经济恢复，沿用金本位的国家的经济仍旧大幅下降。这个教训在当时已被国际组织意识到。1937 年国际劳动局称，“衰退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内均衡的保持必须是货币政策的基本目标，即使这会降低货币的外在价值。”

2、金本位之后是什么？

紧跟金本位的衰落，大部分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想要快速的回到汇率稳定而不是采用能够保持稳定和增长的货币政策。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政策制定者为了重建相关固定汇率制于 1936 年达成三方协议。大部分经济学家非常怀疑把汇率留给市场去决定这一做法。浮动汇率形成的最近两个时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大部分国家返回金本位之前，和三十年代中期，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抛弃金本位之后。第一个时期以德国和其他一些地区货币不稳定与极度通货膨胀、汇

率大幅波动和投机资本流动不稳定为标志。第二时期被描述为“竞争性贬值”，被认为是等同于“以邻为壑”政策而且导致了贸易保护政策。

关于金本位后汇率制度的选择，经济学家们有着不同的观点。Keynes 设法协商所有的考虑提出比较好的办法。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270)中，Keynes 一直反对“固定汇率是使用货币政策保持充分就业的最严重的威胁”这一说法。到三十年的晚期，Keynes 的观点被描述为支持在汇率管制下固定但可调整的汇率制度。但 Keynes 的观点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异端邪说。伦敦经济学院的 Friedrich Hayek 和 Lionel Robbins 痛惜随着金本位的衰退，安全性和独立性的丧失。他们认为固定汇率是安全的和确定的，可调整的汇率是不安全的和不确定的。他们蔑视 Keynes 的“货币民族主义”，强调不兑现纸币在一些领域会带来货币不稳定和经济动荡。

当然也有经济学家支持浮动汇率制，像 James Meade 和 Roy Harrod，但是他们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明。在美国人眼中，只要美元的购买力是稳定的就能提高世界经济的稳定性。Williams 想要在完全固定和完全浮动之间达到一种折中，他相信对于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哪个更好这一问题没有一个普遍的答案。Frank Graham 和 Charles Whittlesey (1934,401) 坚持认为应采取独立货币政策，浮动汇率制度是必要的，不变的汇率制度会带来更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因此金本位的衰落引发了关于哪一种货币制度将会取代它的争论。一致的观点是汇率稳定是理想的，尽管在一些情况下汇率不得不调整，但是浮动汇率是不稳定的因而不是令人满意的。

3、关于 1943 年凯恩斯和怀特计划的争论

二战后美国和英国政府开始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制定计划，1943 年 Keynes 和 White 计划出版了。尽管他们在国际贷款机构的结构和顺差、逆差国家的债务调整方面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在汇率制度本身问题上二人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两个计划都认为固定汇率是理想的，尽管汇率变动在收支不平衡时有必要做出调整。虽然经济学家们在凯恩斯和怀特计划之间存在争论，但是关于固定可调整的汇率制度是不存在争论的。

Graham 并不赞同凯恩斯和怀特，他坚持认为国内物价稳定要放在首要位置而汇率稳定次之。而 Nurkse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货币经验》中强调了浮动汇率的历史经验的隐晦的观点，间接地支持了 Keynes-White 计划。Nurkse(1944,137) 认为，纸币汇率不能在市场供需的影响下自由波动，如果货币自由波动，那么投机机会导致灾难。即便在远期市场上，汇率波动也会不可避免地妨碍国际贸易，甚至造成混乱。哈佛大学的 Gottfried Haberle (1945,309,311)，一个晚期浮动汇率

的支持者，认为“自由汇率体系将会导致严重的不尽人意的后果，它将煽动资本战争和暴力投机，很少有浮动汇率的历史案例，更没有成功的案例。”

4、布雷登森林协议

鉴于凯恩斯和怀特在货币体系问题上的一致意见，固定但可调整的汇率制度在布雷登森林会议中得到了认可。在布雷登会议上尽管关于 IMF 的一些其他建议，像顺差国和逆差国的调整压力和国际储备的地位这些问题上存在争议，但是在汇率制度问题上并不存在争议。

1944 年会议后，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关于汇率制度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然而新体系的运行并不是平稳的。在收到美国的贷款后，1947 年英国被要求使用英镑兑换美元，这造成了大规模的挤兑。相对于贬值，英国推迟可兑换性计划，再次实行控制。英镑升值，但是代替通过紧缩解决三方困境，英国政府使用汇率摆脱经济下滑的压力，虽然这限制了进口并造成了经济短缺。英国不是孤独的：美元短缺——过度的美元需求意味着很多欧洲国家不得不配给外汇来限制进口支出，如果他们不愿意调整汇率。Graham (1949,18) 认为“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必须要么放弃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民族货币主权。”英国经济学家们渐渐增加对这一观点的信任。Milton Friedman 的著名文章《浮动汇率的案例》在 1953 年发表。同时，加拿大采取了浮动汇率而且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转移到支持浮动汇率的方向上来。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布雷登森林体系衰落后关于汇率制度的争论持续了近二十多年。

结论

尽管在 1944 年布雷登森林会议期间，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被广泛讨论，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在官员之间很少有关于货币制度的争论。很少有经济学家争议那段历史，认为将重点放在固定汇率可能有损于其他理想的政策目标，像国内货币自主权、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他们批判布雷登森林协议没有直面困境和三难选择，在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上，最终证明扮演了一个毁灭的角色。

本文原题为“The missing bretton woods debate over flexible exchange rates”。本文作者 Douglas A. Irwin 为达特茅斯学院经济系社会科学教授，美国经济研究局的研究助理，同时也担任过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本文于 2017 年 2 月发表于 Working Paper 23037。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国制造业：特朗普会遣回高收入工作吗？

Guntram B. Wolff / 文 郭子睿 / 编译

导读：特朗普计划为美国遣回高收入的制造业工作，但制造业收入真的会比服务业高吗？而且，劳动力在不同的部门之间很难转移。激进的贸易政策也许会为制造业创造工作，但不一定有利于所有的普通市民。编译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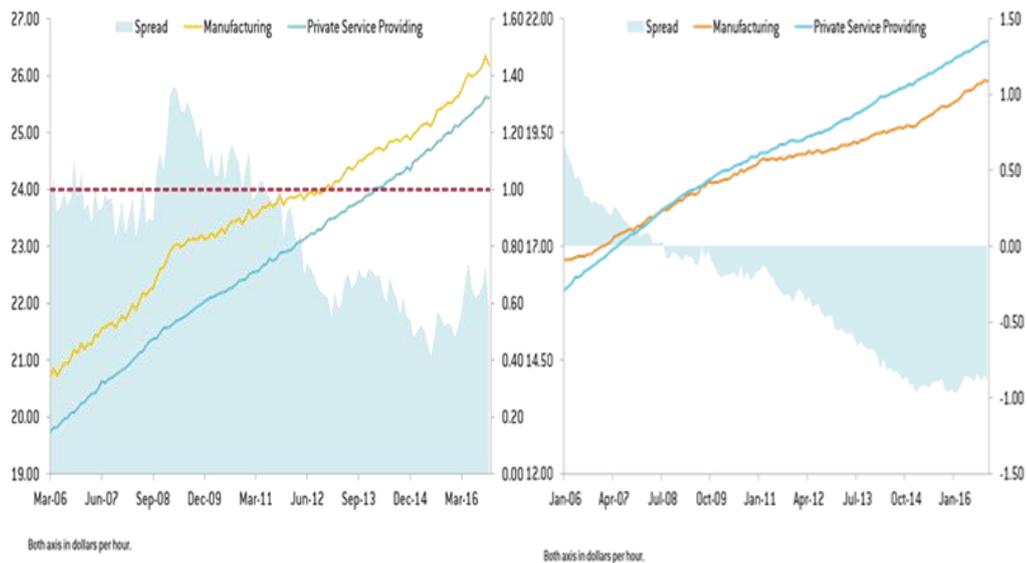
特朗普计划为美国遣回高收入的制造业工作，但问题是，制造业收入真的会比服务业高吗？而且，劳动力在不同的部门之间很难转移。激进的贸易政策也许会为制造业创造工作，但不一定有利于所有的普通市民。特朗普承诺“更公平”的贸易谈判，来降低美国的贸易赤字，并保护制造业。

特朗普的两个经济顾问也发表声明：贸易政策允许企业搬离美国，使得留在美国的都是报酬较低的工作。糟糕的赤字贸易降低了国内制造业的规模，美国工人不得不在服务业就业。服务业部门的工资通常低于制造业。

服务业部门的工资真的低于制造业吗？

下图展示的是美国最近十年制造业和服务业不同群体的平均每小时收入演变。左图表示所有就业者的平均收入，可以发现制造业高于服务业，但二者之间的差距迅速降低。右图表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普通工人的平均收入，可见服务业已经高于制造业。由经济学理论可知，在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不同部门之间的工资具有收敛趋势。

图 1 左：所有就业者平均每小时收入 图 1 右：生产和基层员工平均每小时收入



强制美国企业迁回美国会带来什么影响？

如果制造业企业将生产线迁回美国，以福特汽车为例，可能会出现如下两种情景：

1 如果美国不对外国的竞争者施加关税，美国居民将会购买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而不是本地生产的福特汽车。因为墨西哥的工资低，生产的汽车更加便宜。这样福特不得不减产，从而导致工作职位减少。

2 当然，特朗普会增加关税以保护美国的生产。美国居民不得不购买昂贵的本地生产的汽车，从而压缩对服务业的消费。制造业的工资的确会上升，会吸引大量的劳动力从其他行业转移过来，逐渐的压缩不同行业之间的工资差异。但美国却丧失了贸易带来便宜商品的好处。

上述情景还没有考虑贸易伙伴对美国采取的惩罚性措施，而这会对美国的制造业带来负面影响。而且，工人不可能无障碍的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部门。对于制造业的失业工人来讲，制造业的回归的确是好消息，但对于服务业的失业工人，却无法享受这种好处。

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是，美国经济对一些国家的开放速度太快了，比如中国。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由于贸易导致的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并不容易进行调整。对于向中国这样的竞争对手开放得太快并不是一个最优的策略，而且很难再提高贸易壁垒。因此，从整体来看特朗普的策略看起来像一个亏本生意。在不发生贸易战的前提下，这可能意味着带来更多的制造业岗位，但这些工作很难进行更高的支付，而且美国的服务业工资一定会迎头赶上。

本文原题为“Manufacturing in the US: Will Trump’s strategy repatriate highly-paid jobs?”。本文作者 Guntram B. Wolff 是 Bruegel 的主任。本文于 2017 年 1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央行会有更多的独立性吗？

Wouter den Haan, Martin Ellison, Ethan Ilzetzki, Michael McMahon, Ricardo Reis/文 司丹/编译

导读：过去的 30 年，发达经济体大多数的央行被赋予独立实施货币政策的权利，不受财政和政治当局的干预。最近一项关于欧洲央行未来会有更多独立性的调查显示：第一，70 个受访人员中只有 31 个不同意在可预见的未来，英国和欧元区央行的独立性会有重大变化；第二，央行独立性的下降可能会带来更高的通胀。编译如下：

过去的 30 年，发达经济体大多数的央行被赋予独立实施货币政策的权利，不受财政和政治当局的干预。今天，几乎所有 OECD 国家的央行都被赋予了政治任务。与央行独立性最相关的是通胀目标制的实施，央行宣布他们在未来的通胀目标，公开透明的描述不同的政策选择。

研究表明，央行的透明度、可置信度以及使用资产负债表的能力对于央行的政策实施至关重要。央行的独立性越高，通胀和失业往往越低，波动性也较低。但今天央行不得不承担一些维护金融稳定的政治任务，与其它一些机构合作实施宏观审慎政策抑制系统性风险。这种制度性的压力会降低央行的独立性。

央行还会具有独立性吗

尽管学术上一直强调央行独立性的价值，但在未来这种趋势有可能发生反转。美联储副主席费舍尔最近描述了央行独立性所面临的挑战。随着中央银行为金融稳定承担更多的责任，在金融危机期间使用非传统货币政策，以及央行直接参与财政政策的讨论，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质疑央行的独立性。在欧元区，只有 30% 的德国人信任欧央行。在英国，评论家批判英格兰银行参与脱欧讨论。在美国，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不断批判美联储，国会成员也认为应该加强对美联储的监督。

基于我们调研对象多为欧洲的经济学家，我们访谈的焦点是欧央行和英格兰银行。

第一个问题：你认为在接下来的 48 个月，欧元区和英国的央行独立性会下降吗？

结果表明，32% 的经济学家同意或者强烈同意，45% 的经济学家不同意或者强烈不同意，22% 的经济学家表示中立。考虑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央行保持独立性一直是没争议的。上述结果说明央行独立性在未来可能会发生重要变化。尽管上述访谈的结果不一，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央行的独立性再未来一定会受到挑战。不同意央行独立性下降的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挑战是否足够强或者持续是否足够久以至于改变央行的独立性。比如 David Miles 认为那些对央行独立性的批判并不能威胁到央行的独立性，只是会影响央行设置的目标。有的经济学家认为迫于制度的延续，央行的独立性在短期内很难改变。

关于央行独立性受到挑战的原因如下：第一，民粹主义。随着西方世界民粹主义的抬头，有越来越多的游行示威反对专家学者，质疑这些机构的权利，包括中央银行。另外，随着不断的政治换届公投，政治压力很难预测；第二，世界经济的变化。央行独立性的上升源于成功的治理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通胀。但金融危机之后欧央行一直致力于维护金融稳定，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为政府债务融资。一旦央行涉及到多个目标，就需要权衡，需要重新评估其行为的社会福利；第三，央行的可置信度下降。在危机之前，央行无视信贷的飙升，危机之后随意的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并不能很好的刺激经济，这动摇了大众对央行的信心。

第二个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央行独立性的下降会导致更高的通胀，这一观点在接下来 48 个月的西方经济还成立吗？

结果表明，34% 的经济学家不同意或者强烈不同意，48% 的同意或者强烈同意。同意的经济学家提供的评论较少。John Driffill 认为如果民粹政府加强对货币政策的控制，短期内可能有助于降低通胀，但长期一定会带来通胀上行的风险。Christopher Pissarides 认为金融市场会把央行独立性的下降作为一个政治调整通胀目标制的信号，从而调整通胀预期。

不同意的经济学家认为，当前经济需求疲软，很难发生高通胀，即便是央行的独立性下降。当前的经济状态下，央行很难改变通胀。Martin Ellison 认为政治压力不一定都要求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影响要视情况而定。John Muellbauer 也这样认为，在保持央行独立性的情况下，央行一直为债务融资。如果政治明确要求禁止央行为债务进行货币融资，虽然央行的独立性下降，也不会带来通胀上行的风险。

第三个问题：通常来讲，你是否同意在未来大家还是期待央行保持独立性？

关于这个问题受访者的回答基本一致。49 位受访者中，46 位同意或者强烈同意，2 位不同意或强烈不同意，1 位中立。多数专家认为，出于政治目的，政治当局为了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偏好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会带来通胀上行的风险。而保持独立性的央行决策会从中长期考虑，对经济的运行更加负责。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在未来央行的独立性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当前的经济环境已完全不同于当初央行实施通胀目标制的环境。但大多数专家还是期待在未来，央行能保持独立性，减少政策目标，更好的负责经济运行。

本文原题为“The future of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本文作者 Wouter den Haan 为伦敦学院经济系和宏观经济中心的联合董事，Martin Ellison 为牛津大学经济系教授，Ethan Ilzetzki 为伦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Michael McMahon 为华威大学经济系副教授，Ricardo Reis 为伦敦学院经济系教授。本文于 2017 年 1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人民币国际化的下一战场——“一带一路”倡议与伦敦市场

Dr Paola Subacchi , Matthew Oxenford, 刘东民, 高海红, 徐奇渊, 李远芳, 宋爽/文

谢晨月/编译

导读：本文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和中国社科院合作研究的成果。文章研究了利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来扩大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伦敦离岸金融市场使用的可行性。编译如下：

在过去的十八个月里，人民币国际化进入了新阶段。中国国内经济增速的持续下行，加之在岸市场人民币持续的低利率，使得离岸人民币债市的扩张速度急剧放缓。

中国在 2013 年底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这个战略旨在倡导亚洲 60 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单纯的对外投资议程，其对促进人民币汇率改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也具有重要含义。本文研究了利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来扩大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伦敦离岸金融市场使用的可行性。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中国社科院研究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潜在因素，一带一路项目的投资需求以及中国和英国之间的潜在合作机会；第二部分包括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的人民币国际化动态，以及伦敦是否可以为人民币主导的项目融资；第三部分则提出了一系列促进中国和英国政府间合作的建议，扩大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伦敦离岸金融市场的使用。

第一部分：北京方面的观点

自 2009 年中国政府推行人民币国际化以来，人民币在贸易结算、对外直接投资、外汇交易以及离岸金融中心建设方面均取得重大进展。到 2016 年 9 月，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和第八大外汇交易货币。2016 年 10 月，人民币成功加入 IMF 的 SDR 货币篮子。但上述的人民币国际化成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以及中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在当前人民币不断贬值的预期下，中国加强了资本账户管制，非居民获得人民币资产越来越难，离岸人民币存款也急剧萎缩。

尽管上述因素均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但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国际化仍有很多潜在的新的推动因素。这包括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倡议，创建新的金融基础设施像银行间跨境结算体系，中国企业、银行以及政府迅速增加的对外投资，以及中国主导的新的金融机构，如亚投行等。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通过经常账户促进人民币的贸易结算。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目的就是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2015 年中国企业与沿线国家签订 3987 个建设协议，扩大中国的商品和

服务出口,增加了人民币的贸易结算需求。第二,通过资本账户促进人民币流出。随着一带一路项目的推进,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在增加,通过资本账户的人民币流出也相应增加。第三,一带一路倡议更多国家选择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资产。随着沿线国家更多的使用人民币,人民币资产的需求也相应增加。这位离岸金融市场进一步丰富人民币金融产品提供了机会。一带一路的项目也需要人民币资产来规避外汇风险。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面临巨大的融资缺口。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以基础设施为主,可以弥补新兴市场的融资缺口。

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也是重要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除了人民币债券之外,伦敦可以发行更多的人民币金融产品强化其离岸市场的作用。包括与一带一路项目投资相关的产品,财富管理产品,资产证券化,中国地方债以及其它更多的复杂产品。在各种产品的发行设计时,伦敦可以与中国的投资者进行合作。

第二部分：伦敦方面的观点

在过去的 18 个月,在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下,人民币国际化进入了新阶段。一带一路倡议为海外人民币创造大量的需求。该倡议旨在弥补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需求和融资缺口。从 2008 到 2020 年,该缺口大致在 1 万亿美元左右的规模。中国政府也很难独自弥补融资缺口,离岸市场点心债的发行有助于弥补,也有利于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伦敦作为人民币离岸市场,在地理位置上有优势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融资。伦敦经常为国际上多样化的投资者服务,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会计和报告,并且有金融精英专门设计复杂的项目融资工具。当然,伦敦也需要加强一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尤其需要建立一个二级市场和完善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率曲线,为一带一路的项目对冲相应的政治风险,促进“绿色融资”的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为伦敦带来发展的机遇,但中国不断现代化的金融体系也会威胁离岸市场的发展。随着中国金融的开放,如果外国投资者很容易在在岸市场发行债券,而且发行成本低于离岸市场,那么离岸市场的作用就会大大降低。尽管中国也在努力的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但如果上述情形出现,香港和伦敦这些离岸中心也不会欢迎。

第三部分：政策讨论

一带一路项目可以刺激人民币在海外流通使用,从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同时,这些企业发行人民币债券也有利于增加人民币在离岸市场的规模,解决离岸市场的流动性不足。为了促进这一倡议,本文提出 16 条关于中英政府如何合作的建议,支持人民币国际化在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中的运用。这些建议大致可以

分为五类：提供政策指导，扩大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开发其它离岸人民币产品，建设离岸人民币市场基础设施以及确定中英合作的优先级。

1 关于使用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为一带一路倡议项目融资，中国政府需要给出官方策略指导。

2 随着在岸市场的不断自由化和开放，中国政府需要给出官方指导如何看待离岸市场的未来。

3 中国政策性银行在离岸市场发行超过 10 年期的债券时，需要确定基准利率以便市场发行。

4 可以鼓励中国地方政府在伦敦发行地方债。

5 中英当局鼓励发展伦敦人民币债券二级市场。

6 在伦敦，银行可以探索发行人民币资产证券化产品。

7 在伦敦，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尝试发行离岸人民币财富管理产品。

8 在伦敦，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合作成立人民币投资基金。

9 中国人民银行和英格兰银行扩大货币互换规模。

10 中国政府承诺非中国人的一带一路投资者不受政治风险的影响。

11 人民币跨境贷款章程可以拓展到伦敦。

12 中国当局和伦敦应该扩大中英股票市场之间的合作。

13 中国和英国政府达成协议促进绿色债券的跨境发行。

14 中国和英国政府促进与一带一路地区之间的“三角合作”。

15 中国和英国政府积极合作，促进中英企业之间共同融资建立合作关系。

16 中国和英国的利益相关者也要保持合作，促进实施上述政策建议。

本文原题为“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London Market – the Next Steps in Renminbi Internationalization?”。本文作者 Dr Paola Subacchi 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研究主管，Matthew Oxenford 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刘东民，高海红，徐奇渊，李远芳，宋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1 月刊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达沃斯，中国角色的转变

Bessma Momani / 文 安婧宜 / 编译

导读：曾几何时，中国还因被认不負責任而饱受争议，如今它已肩负世界稳定的重担。在达沃斯论坛上，中国主席习近平的演讲指出，中国将继续促进全球合作和绿色创新，以此来保障全球经济增长。反观美国，特朗普的表现则不尽如人意。本文认为，未来中国将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世界格局也将经历沧桑巨变。编译如下：

十年的时光，可以带来巨大的改变。在 2000 年的时候，中国还被为不負責任而饱受争议，如今它已肩负世界稳定的重担。这样的事实使得中国主席习近平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合作中威胁全球繁荣和增长的问题面前，采取了坚决的防卫策略。

相比之下，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关于世界经济规则的发言则十分让人失望。

如果习近平的演讲面向的是达沃斯的政治经济精英，中国则成为决定世界社会和经济利益的最强音。中国要求各国参加中国承办的自由贸易，也使得发展中国家有机会进入自由市场。

确实，中国，一个拥有上亿人口和广阔领土却仍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目前领跑着世界经济。很明显，世界格局已发生沧桑巨变。

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不认为世界经济的病灶在于“外部力量”或经济全球化。像遗忘的演讲一样，他认为目前的争端、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性、恐怖主义的兴起和难民危机是真正的问题。

他并未点明，美国对于中东政局的干扰带来了我们眼前的区域争端，比如 2003 年以来在伊拉克发生的事情。他也认为追逐利益和不规范的市场是 2008 年金融危机的根源。习近平高度赞扬了 G20 集团，认为它促进了世界经济管理和银行规范。但他和其他领导人担心特朗普可能会破坏对美国银行和投资公司制定的规则。

纽约是国际经济危机的发源地，但雅典、马德里和都柏林却遭受了惨重的影响。

从金融层面到贸易层面，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或许不会再扮演规则实施者的角色，尽管它曾从中受益。相反，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有望通过一带一路通过陆上、海上和空中道路连接亚洲和欧洲、非洲。习近平认为一带一路可以带来外国投资、经济增长和自由贸易。他曾宣布中国愿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参加自由贸易，而美国却选择保护壁垒和撕毁协议。

美国曾宣布自己是世界发展、技术和创新的中心，但习近平表明了中国鼓励国内消费和储蓄，以此来保障第三产业的增长，投资促进绿色革命。

习近平不赞同全球化会带来弊病的观点，指出联合会带来生产力、技术和科技进步。他确实没有反对世界仍然存在不平等，因为蛋糕并没有做得更大，但是各国需要抵抗消极影响。习近平认为，世界会面临新的机遇，包括人工智能、3d打印和绿色科技。与特朗普的预言不通，习近平对于未来的看法更加乐观。

为了抵御像 1930 年那样的大萧条中的以邻为壑的政策，美国制定了货币政策，促进全球贸易。为了阻止资本外逃伤害美国经济，美联储主席耶伦对利率十分敏感，而这是特朗普所反对的。而习近平则承诺，中国将防止人民币贬值及其可能引发的货币战争。

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似乎不太负责任，而中国则更加称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和团结合作的保证。或许下一年度，世界经济论坛会由中国举办，验证了世界格局真的发生巨变了。

本文原题为“*In Davos, China Steps to the Fore*”。作者 Bessma Momani 为 CIGI 论坛高级成员，本文于 2017 年 1 月刊于 CIG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内涵及其重要性

Bonnie S. Glaser 和 Michael J. Green/文 黄杨荔/编译

导读：被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名为国务卿的雷克斯·蒂尔纳森重申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引发舆论对该政策的关注。本文简要介绍该政策的内涵及其重要性。编译如下：

1月11日，被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名为国务卿的雷克斯·蒂尔纳森在其参议院听证会上，基于《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六项保证”重申了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并表示其不知道任何改变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的计划。

问题 1：何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该政策如何诞生？

1979年，美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PRC)，不再承认中华民国(ROC)，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唯一，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中国，不再将中华民国作为独立的主权实体。

然而，关于中国提出对台湾拥有独立主权的要求，美国并未给予让步。相反，美国认知(acknowledge)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尽管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仍愿意推进外交承认。当中国试图把中文文本从“认知”改为“承认”(recognize)，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一次参议院听证会上告诉提问者：“(我们)认为英语文本具有约束力。我们认为‘认知’一词是美国决定的。”在1982年8月17日的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国更进一步，声称无意追求“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这一天，美国提出了“一个中国”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只认知中国关于台湾是其一部分的立场。因此，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正式关系，并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在此之后，每一届新上任的美国政府都会重申“一个中国”政策。这一做法维护了台湾海峡的稳定性，使得中国大陆和台湾相对和平地追求各自的政治和社会经济转型。

问题 2：关于谁对台湾拥有主权，美国立场如何？

在1951年旧金山和平条约中，日本放弃了对福尔摩沙和澎湖群岛的“所有权力、头衔和要求”。然而，无论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不是该条约的缔约国，因此并非日本声明的受益者。虽然尼克松总统的私人笔记表明，他愿意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随后美国文档和声明均显示，美国在台湾主权问题上并无立场。美国对台湾主权问题的立场保持稳定，与其“一个中国”政策一致：台湾海峡两岸在此问题上至今悬而未决，仍在寻求相互尊重而和平的解决方式。美国既不认同中国政府对台湾宣称拥有主权，也不认同台湾所谓的中华民国是独立主权国家的说法。

问题 3：何为《台湾关系法》，其在美国对台政策中起到什么角色？

自卡特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1979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台湾关系法》，以保护美国在台湾的安全与商业利益。该法律在缺乏正式外交关系的环境下提供了一个维持双方关系的框架，列出了美国对台湾安全问题的承诺，并授权国会监督美国对台政策的各方面。该法律要求总统在预期台湾面临任何危险的情况下立即通知国会，并与国会协商以制定适当的应对计划。该法律也授权商业、文化及其他美国与台湾人民间关系的延续性。每一任国会都重申该法律，以确保正式外交关系的缺乏不会对美国 and 台湾之间持续强劲、实质性的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台湾关系法》提出：美国在台协会作为处理美国与台湾关系的法人实体；明确表示，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建立在期望未来以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基础上；认为以和平手段以外的任何方式，包括抵制和禁运等来解决台湾问题，都是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全的威胁，美国政府将对此严肃关切；要求允许美国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要求美国面对可能危及台湾人民安全或社会经济体系的任何诉诸武力或其他形式的强迫时，保持抵制的能力。

《台湾关系法》也明确重申，维护和促进台湾所有人的人权是美国的目标。该法律给予美国一定法律手段，以继续与台湾在经济、文化和安全方面的关系。所有项目、交易和关系都由一个美国国务院合同下的非盈利公司——美国在台协会执行，以代替官方交往。该协会及其对手方——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TECRO)一起开展美国和台湾之间的非官方关系，但均不作为大使馆运营。

问题 4：何为“对台六项保证”？

在 1982 年 8 月 17 日签署的中美第三份公报中，美国称其“不寻求向台湾长期出售武器的政策”，“对台出售的武器无论在性质还是数量上都不会超过中美建交以来的水平”，并“打算逐渐减少向台湾销售的武器，在一段时间后最终停止”。

考虑到公报可能对台湾造成的影响，里根总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中放置了一份秘密备忘录，表示美国愿意减少对台出售武器以中国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承诺的持续为条件。备忘录还强调，向台湾提供武器的数量和性质都必须视中华人民共和国造成的威胁而定。此外，里根总统还采取额外措施——请美国在台协会负责人詹姆斯·李洁明以总统的名义，口头提供了六项美国对台政策的保证，包括美国：

- 未同意对向中华民国出售武器设置终止日期；
- 未同意就向中华民国出售武器一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事先磋商；
- 不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之间扮演仲裁角色；
- 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
- 未改变其对台湾主权问题的立场；

- 不会对中华民国施压以使其参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谈判。

问题 5：为何台湾对美国很重要？

台湾于 1987 年结束戒严，于 1996 年举行第一次直接民主总统选举。如今，台湾实行充分的民主政治，尊重人权和法治，拥有开放的经济体系，2015 年成为美国第九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 666 亿美元。台湾是美国在亚洲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有着稳健、繁荣、自由、有序的社会环境，强健的制度使其成为该地区的典范。

台湾和美国在全球合作培训框架下参与了许多联合项目，共同致力于扩大双边合作，以应对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公共卫生、环保、能源、科技、教育和区域发展等领域的全球挑战。2012 年，两国共同发起太平洋岛屿领导合作，美国于 2014 年作为创始合伙人之一加入台湾发起的国际环境合作项目。近年来，双方在应对埃博拉病毒、中东难民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中的协作也彰显了二者的合作关系。显然，台湾不仅对于美国，对该地区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

台湾政府致力于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这也是美国在该区域的首要目标之一。美国坚守其对台湾人民的长期承诺，这对维持美国在东亚的可信度十分重要。

问题 6：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有什么义务和承诺？

美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自 1955 年 3 月 3 日至 1980 年 1 月 1 日有效。该条约的终止结束了双方在对方遭到攻击时必须提供军事支援的义务，部分条约内容包含于《台湾关系法》。《关系法》明确提出，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决定建立在台湾问题将以和平方式解决的预期之上。《关系法》为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提出了一套政策，但关于武器销售的具体决定取决于总统。过去 10 年中，美国批准了 237 亿美元的对台军售。

问题 7：为何中国担心台湾独立？

1997 年 7 月香港回归后，台湾成为中国政府声称拥有主权但不控制的为数不多的地区之一。大陆和台湾当前的分离状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大阻碍。中国共产党也有着台湾与祖国统一的承诺。大陆普遍认为，没有哪一任中国领导人允许台湾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国际社会承认的独立主权国家。2005 年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中，中国政府提出在三种情况下合理使用“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以保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1)“台独”势力造成台湾分裂；2) 会导致台湾分裂的重大事件；3) 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覆灭。

本文原题为“[What Is the U.S. ‘One China’ Policy, and Why Does it Matter?](#)”。本文作者为 Bonnie S. Glaser, CSIS 亚洲区高级顾问, 和 Michael J. Green, CSIS 亚洲区高级副总裁。本文于 2017 年 1 月刊于 CSIS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菲律宾政治变得更加危险

Joshua Kurlantzick /文 刘立群/编译

导读：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执政以来，其对内、对外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内外相关国际问题专家对菲律宾的国内政策、外交政策以及总统杜特尔特进行了积极的关注和研究。2016年12月7日，对外关系委员会（CFR）网站发表文章《菲律宾政治变得更加危险》。作者主要介绍了现菲律宾政府执政的两个方面来体现杜特尔特的独裁统治和菲律宾的新政治危机，一是杜特尔特政府坚持将前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的尸体埋在英雄墓地，并引起了大规模的街头示威游行活动；二是提出菲律宾总统与副总统的矛盾冲突，以及菲律宾领导人容易受到黑暗势力和法外方式的强迫，最终导致总统离职的危险。编译如下：

自从去年春天，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总统选举以来，菲律宾目睹了煽动性的政治对其文化和制度的影响。虽然杜特尔特赢得了国内外对其努力的赞誉，包括解决南部叛乱和减少菲律宾经济不平等战略的计划，但是他越来越个性化的政治，也极大地破坏了法治。作为这个运动中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杜特尔特经常谴责少数的反对派和监督血腥的政策。杜特尔特打击毒品的战争已经演变成为一场血腥的杀戮狂欢，这对安全部队的力量似乎没有什么限制，只不过是几个月来法治恶化的一个例子。他还威胁记者和相关的其他人员，同时采取一种外交政策来困扰许多菲律宾安全专家。总统的多变风格，虽然受到许多菲律宾公民的欢迎，但经常使人很难知道国内和国际的政策倡议是什么？到底哪个该认真对待，哪个可以忽视？

菲律宾的国家政治既嘈杂又充满活力，不过现在变得特别危险，因为反对杜特尔特的形势正在逐渐形成。在杜特尔特政府批准了前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的尸体埋在英雄墓地之后，几乎没有任何预兆性的，反对杜特尔特的抗议在马尼拉扩大。抗议活动从菲律宾公民意识到马科斯将被介入后开始，并迅速从马尼拉扩大到该国的其他地方，不仅包括记得马科斯时代的菲律宾老人，还有一些年轻的男人和女人也反对马科斯埋葬事宜，人们利用这些示威来表达对杜特尔特独裁政治的愤怒。

正如 Mong Palatino 在《外交报》中指出的，杜特尔特似乎低估了人们对马科斯时代和给予马科斯以英雄埋葬事件的强烈愤怒；也低估了反对马科斯葬礼抗议可能成为支持前政府和反对党的人们，对杜特尔特政策和执政方式不满的可能性。同时，杜特尔特政府部门一直在回应示威游行活动，称示威抗议者正在试图挑起暴力运动。

马科斯埋葬示威活动之后，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危机。在菲律宾，副总统和总统是分别选举产生的，所以国家经常会出现来自不同党派的副总统和总统。实际上，在整个总统任期内，正副总统二人才是主要的矛盾冲突对手。目前的情况：

在同一次选举中，杜特尔特当选总统，莱尼·罗布雷多作为一个和杜特尔特隶属不同党派的，受人尊敬的人权律师、前市长当选为副总统。

可以预见，由于对人权规范不存在同一兴趣，在他们执政的第一天就发生了争执。虽然罗布雷多被授予内阁职位，除了副总统职位，她还在内阁担任住房部秘书。但是，罗布雷多声称她基本上被冻结在内阁会议，她的机构也被忽视。本月初，罗布雷多辞去了她作为房屋部秘书的职位，不过保留了她的副总统职位。她告诉记者，她给杜特尔特写了一封信说：“留在你的内阁已经站不住脚了。”更令人担心的是，她公开暗示，政府一直在操纵将她革除副总统职务，前独裁者的儿子费迪南德·马科斯·Jr 和杜特尔特的亲密盟友可能会取代她。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警告说，她有一个“偷窃”副总统的策划。

杜特尔特和罗布雷多越来越公开疏远对方的行为是很危险的。杜特尔特可以人为操作替换掉罗布雷多，尽管此举的合宪性会面临很大的挑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他替换掉罗布雷多的计划成功，可能会触发更大的抗议，因为罗布雷多几乎和总统一样受欢迎。第二令人担忧的是，许多反对杜特尔特野蛮风格的菲律宾人，可以越来越确信罗布雷多也可以成为一个可行的领导人，特别是如果杜特尔特继续滥用法治的话。虽然杜特尔特的行为是很危险的，即侵蚀法治，可能使菲律宾的安全和保障定位错误，但是如果他的对手想要挑战他，那么他们应该在立法机关、法院和媒体等方面多做文章。用这些方法可以抵制总统滥用职权，并可以加强法治。但是在过去有太多这样的现象，菲律宾领导人受到黑暗势力的强迫，有时还是通过法外的方式。比如有一个深受杜特尔特对手所喜爱的副总统，就会加剧对总统职位的某种法外挑战的风险。

人们没必要去探寻这样一个例子，即一个有争议、危险的总统被人用可疑的手段踢出局，而他的副总统将接任自己的职位，并且在推翻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事实上，这大概是前总统（现在是马尼拉市长）约瑟夫·埃斯特拉达在 2001 年发生的事情，他被副总统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所取代。他的离职使得菲律宾人民摆脱了一个无法加强法治的总统，不过之后发生了大规模的街头示威游行、弹劾以及军队收缩等事件来支持他。之后埃斯特拉达被认定为贪污，在办公室里，他经历了来自顾问们和反对者们对他贪污的指控和抱怨，自此他对公共政策再无兴趣。但是埃斯特拉达的离职，法律程序、游行抗议和政变等一系列事件的结合并没有在菲律宾制度和机构设置上为解决总统的非法行为活动提供任何先例。

本文原题名为“Philippine Politics Become Even More Dangerous”。本文作者为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记者，外交关系委员会东南亚问题研究员 Joshua Kurlantzick。本文刊于 2016 年 12 月 7 日 CFR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特朗普真的可以与普金打好交道吗

Colin P. Clarke、William Courtney/文 章珏/编译

导读：作者认为，近来俄美关系的冷淡是因为俄罗斯的外交表现十分不切实际。作者回顾了近来俄美两国的矛盾焦点，并对特朗普上台后将面对的俄罗斯做了基本的定位，最后指出，未来的俄美关系，机遇与挑战并存。编译如下：

本月 14 日，俄罗斯总统普金在致电获得总统选举胜利的特朗普后称，双方就展开建设性合作达成共识。但现实更可能是，普金急于展开合作，但是并未做好充足准备。

虽然俄罗斯是大国，但是它似乎高估了自己的重要性，并一味期许美国做出单方面的让步。若是长此以往，在特朗普执政前期，美俄关系就会急转直下。

想与俄罗斯打好交道的一大障碍就是其表现出来的姿态有时是不实际的。除了对乌克兰的野心外，普金上周表示并不是俄罗斯的失误导致俄美关系的冷淡。而在商谈恢复双方关于处理武器级钚的协议时，普金又提出了不实际的前提条件。

除了这些问题，特朗普未来遇到的会是个怎样的俄罗斯呢？

首先，俄罗斯是个正在衰落的经济大国，这削弱了他与西方对抗的效力。由于国家对贸易的不当管控，从 2012 年开始，俄罗斯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放缓，再加上油价的走低和欧洲的经济制裁，俄罗斯的经济处于长期停滞状态。

其次，俄罗斯政府的国内支持将会岌岌可危。家庭收入的持续下降正引发民众的焦虑，而去年爆出的杜马选举被操纵一事则反映了投票人的冷漠。

普金突然于去年春季宣布将直接管控 40 万人数的国内军队，以及近来俄对独立媒体和市民社会不断扩大的压制都暗示了国内政权的挣扎。

等特朗普上台时，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将趋于自我孤立和批判。虽然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干预支撑了巴沙尔政权，并守住了战线，但是俄罗斯为此付出的政治代价也相当高。

10 月 10 日，由于俄罗斯对阿勒颇东部一些民事设施的打击，法国总统奥朗德称俄罗斯将会因此面临战争罪的起诉。擅自打破本国外交官达成的停火协议后，俄罗斯的军队正协助阿萨德开展对阿勒颇的军事打击。

随着 IS 逐渐失去势力，美国在叙利亚的利益和与俄罗斯的潜在共同利益点可能消失。如果叙利亚内战一直僵持下去，俄罗斯也可能丧失一部分利益。

乌克兰可能成为特朗普测试俄罗斯意志的焦点。普金称俄罗斯没有任何攻击别国的意图，但是俄罗斯的代理人和军队仍旧在东乌克兰激化冲突。

在上个月的明斯克和平进程会议中，法国总统、乌克兰总统和德国总理已对和平进程的止步不前表示痛惜。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仍旧十分严厉，并承诺除非俄罗斯撤离东乌克兰，否则经济制裁将会持续。

此外，俄罗斯违反 1987 中程导弹协议的意图正在上升，外交途径已经无法完全解决该问题，特朗普对此必须施以足够的关注。

一些国会议员已对俄罗斯的实质性违约表示谴责，同时，莫斯科也多次抗议美国在北约东侧部署防御性导弹，哪怕这只是为了防范潜在的伊斯兰威胁。

而俄罗斯的网络间谍行为和试图操纵美国政治的行为已经引起了两党的愤怒。

最后，特朗普上台时，俄美双方都在使自己的战略部队不断现代化。前任领导人好不容易达成了限制武器的协议。但是，除非俄罗斯停止对中程导弹协议的破坏，否则，美国国会很难通过一项新的协议。

俄美关系的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双边的投资和贸易，在国际太空站的合作将利于双方关系的稳定。而停止经济制裁将带来更多的收益。

上个月，普金称大国应通过多边手段寻求利益。如果俄罗斯能朝着多边主义不断努力，并表现得更像个合作型大国，而不是个掠夺者，那么，在特朗普任期内，俄美关系将得到改善。

本文原题为“Can Trump Really Do Deals with Vladimir Putin?”。本文作者为美国兰德公司政治学家 Colin P. Clarke 和兰德公司兼职研究员、美国驻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前任大使 William Courtney。本文刊于 2016 年 11 月 21 日 RAND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将危及台湾

Michael S. Chase、Derek Grossman/文 章珏/编译

导读：被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名为国务卿的雷克斯·蒂尔纳森重申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引发舆论对该政策的关注。本文简要介绍该政策的内涵及其重要性。编译如下：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坚称台湾问题是中美双边关系中最敏感的话题。但近几年来，中美在南海激烈的军事冲突使得台湾问题黯然失色。而本月2日，即将上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话的消息却使得台湾问题立马又成了两国关系中的头等大事。最近几天，面对特朗普与蔡英文的接触，中国政府不断发出警告。特别是本月11日，特朗普在福布斯新闻网上释放出可能将“一中原则”与贸易等问题进行捆绑交易的信号后。

中国政府官员和官方媒体警告称，“一中原则”是不容谈判的。中国将之视为发展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石和开展合作的首要条件。中国官方强调了台湾这个核心利益的决心。

面对即将上台的美国政府，中国政府有一大堆手段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例如召回驻美大使，停止与美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等，若情势严重的话，还可能采取断交的手段。

而在直面台湾的时候，大陆政府有着更多的手段和更强的效力。不少台湾观察家担心大陆政府可能因特朗普关于“一中原则”的言论而向台湾发难。比如，大陆政府可以采取手段使台湾仅存的21个外交伙伴转而承认大陆政府的合法地位并与台湾断交，或者采取经济手段如减少赴台游客数量。

而最大的担忧是，中国对台示威或采取武力的能力正在上升。中国空军在台湾附近采取行动，甚至派遣战斗机实施更挑衅的行为有着巨大的可能性。中国的官媒如《环球时报》近几日已经直接建议将武力统一台湾作为一项实际选择。而台湾与大陆的临近以及大陆军事实力的增长折射了台湾对于抵抗大陆军事行动的脆弱性。毕竟大陆二十几年军事现代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提高对台作战的行动力。

因此，美国若放弃“一中原则”，很可能导致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而这很可能引发其他领域的问题的恶化，甚至可能触发一场本可回避的危机。将台湾以及2300万台湾人民做为美国对中国的谈判筹码将会危及台湾的安全。

美国政府不应该抛弃长久以来实施的有利于维护两岸和平的手段。此外，美国还应该考虑采取具体的措施以加强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这可以包括帮助台湾降低对大陆经济施压的脆弱性，促进台湾在区域和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

色，支持台湾提高军事适应力的努力，通过武器销售和其他形式的安全合作加强威慑力。

在关键领域，通过遵循现存的政策框架，发展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美国不仅能维持区域稳定，还能保护台湾的民主、安全和繁荣。

本文原题为“Walking Away from One-China Policy Imperils Taiwan”。本文作者为兰德公司资深政治学家，兰德研究生院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前沿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和战略问题研究部门的副教授 Michael S. Chase 和兰德公司资深国防问题分析师 Derek Grossman。本文刊于 2016 年 12 月 22 日 RAND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2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简介：1964年由美国海军上将阿利·伯克和大使大卫·阿希尔成立。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跨党派的外交政策智囊团。CSIS主要就经济和安全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和政治战略分析，其重点放在技术、公共政策、国际贸易和金融、能源等。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SIS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5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1名。

网址：<http://csis.org/>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外交关系协会

简介：成立于1921年，是美国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CFR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曾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国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FR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6名。

网址: <http://www.cfr.org/>

RAND Corporation (RAND) 兰德公司

简介: 兰德公司成立于 1948 年, 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在其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其后, RAND 逐步扩展, 并为其它政府以及盈利性团体提供服务。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RAND 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6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8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3 名。

网址: <http://www.rand.org/>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 CIGI 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 由 Jim Balsillie 成立于 2001 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 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 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 <http://www.cigionline.org/>